

《唐世精华》的编者及选诗标准*

孙欣欣

内容摘要:《唐世精华》的编者余俨为明代晚期会稽人,一生仕途不畅,酷好唐诗。其所编选《唐世精华》受晚明性灵思潮的影响,冲破了明中期以来复古派以盛唐为尊的思维定式,将人的个体“性情”作为选诗标准,在明代诗歌思潮发展中以独特的选诗方式彰显着编者的个性主张,在明代诗歌流派纷争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

关键词:《唐世精华》 余俨 性情

—

国家图书馆藏余俨所编《唐世精华》,明万历四其轩刻本,是晚明时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它是我们研究明代唐诗接受及明代诗学思想发展嬗变的重要文献资料。关于这部唐诗选本,目前学界已有研究者关注并做过著录,然而在著录中却存在一些诸如选本名称及编者身份等疑问,需进一步辨析。

关于选本名称问题,目前有两种著录,一种为《唐世精华》,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录此书为:“《唐世精华》,十二卷,明余俨辑,明万历四其轩刻本。”^①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亦录为:“《唐世精华》,十二卷,明余俨辑,明万历四其轩刻本,成都杜甫草堂藏。”^②而另一种则录为《唐诗精华》,如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唐诗精华》,明余俨撰。此书余未见,有明万历四其轩刻本,十二卷,现藏成都杜甫草堂。”^③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唐诗精华》,余俨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书今存。有明万历年间四其轩刻本,藏国家图书馆等地。”^④经笔者目验,国家图书馆藏明代余俨所编、万历四其轩刊刻的这部唐

*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16ZDA174)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二八(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72页。

②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年,第65页。

③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④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诗选本,共十二卷,书内有编者自序:“上下唐之初盛中晚间,共得人百四十七,诗七百有奇,题曰《唐世精华》。”很显然,此选本应名为《唐世精华》,而非《唐诗精华》。

关于《唐世精华》编者余俨,孙琴安、金生奎二人皆著录为:“余俨,字持敬,南昌人,永乐二十一年举人,曾任监察御史等职。”历史上确有此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二在“都察院左右佥都御史”官位下记载:“余俨,江西南昌人,由乡举,正统十四年任右,天顺元年致仕。”^①《江西通志》卷五十二:“余俨,南昌人,常德知府。”^②《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八之《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二十六记载:“景泰二年九月丙申朔,太上皇帝居南宫……壬子,升广东道监察御史余俨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专理清黄。”^③又《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五记载:“天顺元年二月乙未朔……命兵部左侍郎俞纲仍理部事,罢礼部尚书章文、太医院院判欣克敬俱为民,改南京户部右侍郎杨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余俨、大理寺右少卿朱绂、太仆寺少卿李亨俱为知府。”^④综合上述史料可知,这位余俨大约生活于明代初期,南昌人,由乡举,于正统、景泰之际由广东道监察御史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并于天顺元年出任知府。

那么,《唐世精华》的编者是否就是此余俨呢?国家图书馆藏《唐世精华》内有余俨本人所作序,其落款为“万历甲寅中秋会稽余俨谨序”。这条信息告诉我们:首先,编选《唐世精华》的余俨并非南昌人,而是会稽人;其次,万历甲寅年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也就是说,这位余俨至少应为明代中晚期人,而明初那位余俨的生活年代距此时已有近两百年,他是不可能在这个时期作序的。由此可推断,编选《唐世精华》者并非明初的那位余俨,而是另有其人。然而,在会稽及相关方志、家谱中并未见与《唐世精华》编者余俨相关的任何记载,在《唐世精华》内也只有“会稽余望之甫撰,关中杜继芳德馨甫校”的字样,可知这位余俨字望之。但是,在山东《临清县志》中恰巧也记载了一位同为明代人且同名同字的余俨:“字望之,持躬端谨,究心理学,当道累征不起,晚年笑傲林泉,有白傅之风。著有《朴庵文集》、《十岳斋陟厘馆笨庵秦晋纪游诗》诸稿。”^⑤可知这位余俨仕途不畅,晚年过着隐居生活,他与《唐世精华》的编者是否为同一人呢?

①(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89页。

②《江西通志》卷五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4册),第712页。

③(明)孙继宗监修,(明)李贤、陈文、彭时裁:《明实录·英宗睿皇帝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4474页。

④(明)孙继宗监修,(明)李贤、陈文、彭时裁:《明实录·英宗睿皇帝实录》,第5831页。

⑤徐子尚修、张树海等纂:《中国方志丛书·临清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本影印,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134页。

据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①《拟山园选集》所载,他曾经与一位名为余俨的朋友相交甚深,并为之作传,其文如下:

余生望之,越山阴人,名俨,字望之。父柯洲,生望之。幼警颖强记,工制义,尤嗜诗,少为诸生,名甚。起家不造,罹火灾,饘粥不给,仗剑走北都,年二十,良乡某馆为上客,拥皋比,弟子日益众,学使者奖,生映丽有声,娶胡氏,舍挽辂,以舟归越,吟诗遇喜处即大叫,震林木。复入北都,某公延馆谷之。有青衣夜奔,书襟袂服挑达甚都,生拒之厉,后又托老苍头通殷勤,赠杂佩焉,生终不纳……余生两入闱不售,遂烧诸生书而致力于诗,大愤,咤曰:“天乎!青紫中无余生,汉唐坛坛上亦无余生坐位耶?”于是遇嘉景吟哦不能舍、卖文有美,则以分柯洲君,佐其兄之不给,室人胡氏时为供客具,与二三君子谈风雅,达夜不倦。因纵心于名山川,东登岱,西走襄陵,独眺姑射山,北穷马邑银山铁壁,观毳帐沙漠,东南则台荡四明三衢,及楚蜀秦豫,踪迹无不至,至无不摭为诗章。年五十始卜居清源,海内慕生诗,争相交游引重,相得极欢。生持己严峻,终身不肯以利,故一牍一事相浼。壬午兵内讧,梦一老人语曰:“其虚其邪既亟,只且明日弃庐舍,携妻子南归。”离城未六十里,浴铁之骑霆摧雷掣而城陷矣。至杭得酒,与友登顿山寺,握麈尾辩说数千言,至吟得意则醉卧草间,灶米不给亦不问。生贫且老,明世故,指画事忠爱悱惻恍然,不顾利害,于人坦直无城府,虽蹴躐泥淖中,立志较然不贰。病危犹敲诗不已,将瞑复瞪目,呼其子曰:“孟津王觉斯素知我,汝求一文足矣!”他不复言,年六十有几,子名某。太史氏曰:予交望之二十四年,相知不可谓不深,予失家踉跄,联舸至瓜步,欲赠余生,忽不见。又一年,再至杭,始知其死,抑郁磊落,寓于悲歌。噫!吴山越水孰有人焉知望之者哉!^②

此传完整记述了余俨的生平事迹,其中不乏细节描写,可见二人二十四年的交谊之深。据此传可知,王铎的这位挚友余俨,字望之,越州山阴人,山阴县自汉代起便为会稽郡下属,《汉书·地理志》中就有会稽郡山阴县的记载^③。后两县同城而治组成了会稽城,古属越州,即今天的绍兴市。因此,这位余俨首先从其名、其字以及籍贯上与《唐世精华》的编者是完全相符的。此外,根据王铎的生卒年(明万历二十年至清顺治九年)可推断,其挚友余俨的生活年代至少也应是明代中晚期,这与《唐世精华》编者的生活年代也是一致的,且据传中所记,余俨自幼聪颖,少负才名,尤嗜诗,所到之处皆倍受推崇,然仕途不畅,内心郁郁不平,每每寄情于山水,以诗篇抒胸臆。可见这位余俨是一位酷好诗歌者,在其两次科考失败后曾烧掉诸生书,愤然叹曰:“天乎!青紫中无余生,汉

①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嵩樵,又号痴庵,别署烟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

②王铎:《拟山园选集·余望之传》,王钟翰主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72—674页。

③(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上,中华书局,1997年,第1590页。

唐坫坛上亦无余生坐位耶?”话语中既有不平,也暗示出其对汉唐诗坛的尊崇,从此便更加着力于诗歌创作。由此可见,其编选《唐世精华》这样一部唐诗选本亦是在情理之中了。综合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断定,王铎的这位挚友就是《唐世精华》的编选者余俨。此外,传中提到余俨曾于五十岁时隐居清源,而清源恰是今山东省临清县的古称,这正与山东《临清县志》中所载余俨“晚年笑傲林泉”相照应。由此可以肯定,山东《临清县志》中记载的余俨与李铎之友、《唐世精华》的编者余俨应为同一人。

据王铎所作传我们还了解到,余俨自五十岁隐居清源之后,于壬午兵变时梦一老人告诫其离开此地南归,结果当他刚刚离开,清源城即陷落矣。历史上明末的壬午兵变发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当时清军大举进攻河北、山东,在攻占临清(清源)后,又绕济南进入青州,王铎所记当指此事。据此可知,余俨在崇祯十五年(1642)时年龄约为五六十岁,那么他的生年当至早为万历初年,由此可进一步断定余俨应为明代晚期人。在他离开清源之后来到杭州并最终卒于杭州,临终前嘱其子求王铎为其作传,终年六十馀岁。

二

国家图书馆藏《唐世精华》,共十二卷,卷首分别有余俨和孙如游于万历甲寅中秋所撰序文,页下标有“四其轩藏版”。此选以体编次,卷一至卷三为五言古诗、卷四至卷五为七言古诗、卷六至卷七为五言律诗、卷八至卷九为七言律诗、卷十为五言绝句、卷十一为七言绝句、卷十二为五言排律。

明万历时期是思想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随着王阳明心学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对个体自我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人大力张扬人的个性精神,文学领域公安派领袖袁宏道高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大旗,承认并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倡导性灵文学观,他曾说:“唐人之诗,无论工不工,第取而读之,其色鲜妍,如旦晚脱笔研者;今人之诗,即工乎,然句句字字拾人钉短,才离笔研,已似旧诗矣。夫唐人千岁而新,今人脱手而旧,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模拟者所从来异乎!”^①就是将性灵的自然流露看作是唐诗千古而新、流传不朽的根本原因。袁宏道对真性灵的关注,冲破了明中期以来复古派“诗必盛唐”的格套,反对模拟唐诗、固守法度,其诗学思想在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及其羽翼陶望龄、江盈科等人的共同倡导下,形成一股巨浪,在诗坛掀起狂飙。清初钱谦益在谈到公安派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时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濬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②在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性灵思潮的影响下,诗坛风气随之发生了转移,对此钟惺曾有过这样的记述:“今称诗,不排击李于鳞,则人争异之。犹之

①(明)江盈科:《敝篋集引》引,《雪涛阁集》卷八,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上册,岳麓书社,1997年,第398页。

②(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67页。

嘉、隆间,不步趋于鳞者,人争异之也。”^①诗坛对公安派的趋同使复古派气焰大消,这股强劲的“性灵”之风吹向选诗领域,亦影响了选家的审美取向。余俨编选《唐世精华》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冲破复古派以“格调”为标准、以时代论优劣的选诗方式,开始突显人的性情。其书前自序曰:

诗至李唐,所谓古体、近体、长短、歌行、绝句、排律等制,飒飒乎盛矣备矣,蔑以加矣。然自贞观之开元、贞元之乾,宁三百季间,宿老、钜公、大手笔、大宗匠、大家、名家,若雅正、飘逸、雄沉、高古、清新、悲壮、冲淡、真率以及寒瘦、怪癖,虽气骨不同,声律各变,总之不离性情者。

在这里,余俨首先对唐诗作了充分肯定,在他眼中,唐诗体制完备,是诗歌发展的极盛阶段。接着又指出,唐代涌现了众多风格各异的著名诗人,尽管他们的作品气骨与声律各不相同,然而却都是发自性情的产物。由此评价可以看出,余俨对唐诗的认识不同于复古派论诗所特别重视的“气骨”与“声律”,他更加关注的是诗歌的抒情特征。正基于此,他将“性情”作为自己编选《唐世精华》的标准:

选唐诗者自芮挺章《国秀集》爱及我明,无虑数十家,或略于盛而详于晚,或繁于近而简于古,彼去此取,此取彼弃,或同或不同,或少异或大异,家各不同,总之近吾性情者选是。余结发而嗜诗,上自汉魏,下洎六朝,浑噩或乏英华,骈靡则不高古。惟李唐体制音律灿然大成,尤为后学楷式,尤欲窥其藩篱,晨渔盱猎十余年未得诸体之精者,辄手录之,上下唐之初盛中晚间,共得人百四十七,诗七百有奇,题曰《唐世精华》,藏之篋中,聊以适吾之所嗜,取其近吾性情者耳。

自唐代以来,选唐诗者各家不同,但是余俨却认为这些选本皆是本于选家个人性情而定,他们所选取的都是与本人性情相近的诗作。余俨编选《唐世精华》同样如此,之所以选取这一百四十七位诗人的七百餘首诗,其标准只有一个,“近吾性情者耳”。其实,不同选家在编选唐诗时,大都依据其诗学思想及个人喜好来设定标准,例如在明代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有的侧重于声律、有的侧重于气格来选诗。然而余俨却把前人不同的选诗标准归于一点——性情,可见,这种来源于人本体的个性情感在他的诗学观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具体选诗来看,在《唐世精华》所选近七百首^②作品中,初盛唐为435首,中晚唐为256首,且入选最多的诗人乃为李白、杜甫(分别为74首和68首)。这些数字似乎表明《唐世精华》仍未脱复古派之影响,是一部重初盛而轻中晚的唐诗选本。而事实上,通过以上对编者自序的解读可以看出,编者选诗是取其与本人性情相适者,孙如游在为《唐世精华》作序时亦称余俨选诗“唯其什不惟其时”,只重作品本身而无论时代,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凭借这些数字而简单地

①(明)钟惺:《问山亭诗序》,《隐秀轩集》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4页。

②余俨自序中称选诗“七百有奇”,而国家图书馆藏《唐世精华》实际存诗只有691首。

下结论。这样的选诗比例只能说明,初盛唐诗在整体上更契合编者的性情,更能达到与编者的心灵相通。例如,五言古诗,初盛唐与中晚唐的入选比例为119:36,其中余俨最为欣赏的是杜甫(17首),其次是李白(15首)、韦应物(15首)、岑参(12首)。而七古排在前三位的是李白(17首)、杜甫(16首)、岑参(13首),其余诗人大都仅取一两首。从中可见,余俨于唐人古体最为偏重的是盛唐。然而,并不是对所有体式编者都偏重初盛唐,如七律与七绝,入选中晚唐诗的总体数量均超过了初盛唐(分别为56:47及63:31)。七绝一体除李白入选较多之外(达16首),其余十位入选的初盛唐诗人诗歌总量仅为15首,而入选的中晚唐诗人却达41人之多。虽然他们入选诗作数量较为平均,但在绝对数量上却大大超过了初盛唐。可见,余俨选诗并非事先在心中圈定了一个初盛唐的框框,而是真正做到了不以时代论优劣,完全从个人性情出发,寻找与一己之情相适的作品。

既然余俨认为唐诗是诗人主体性情的体现,而选家也是选取与自己性情相适的作品,那么由此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唐诗选本即是选家性情与诗人性情的共同体现,余俨把诗人与选家通过情连接在一起,追寻的是自我性情与诗人性情的相通。例如,在七言绝句一体中,余俨对盛唐两位著名绝句大家李白、王昌龄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择取态度,其中李白入选16首,在所有入选诗人中位列第一,而王昌龄却仅有3首作品入选。李、王二人之七绝在唐代并称,为后人所共同激赏,王世贞称:“七言绝句,王江陵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①叶燮亦云:“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②且王昌龄在当时已有“七绝圣手”的称号,可见其在七绝一体上的确颇有造诣。为何他的七绝作品不受余俨青睐呢?其实,李、王二人七绝虽皆有成就,然其差异性也非常明显。总体而言,李白七绝更为自然,他作诗常常凭借一己之灵感,诗兴一来便脱口而出、即兴而成,从而形成了自然天成的诗歌特点。如其入选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表达了诗人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返还的欢快心情,整首诗轻盈快活,诗笔奔放,自然亲切,正应了他自己的那句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七绝的这些风格特点,在其大量的写景、纪游题材中得到充分体现,而《唐世精华》中恰恰入选此类题材作品较多,如《峨眉山月歌》、《山中问答》、《东鲁门泛舟》、《五老峰》、《陪族叔刑部侍郎曄中书舍人贾至游洞庭湖》(三首)、《苏台览古》、《越中览古》、《早发白帝城》等,占16首诗中的半数以上。相比之下,王昌龄七绝更具匠心,可以说每首诗都是诗人呕心沥血之作,其诗讲究结构布局、起承转合,由锤琢洗练而至完美,虽在边塞及闺怨等题材中王昌龄七绝成就不凡,但是在整体风格上却不如李诗那么真率自然。而李、王七绝风格上的差异又与二人

①(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5页。

②(清)叶燮:《原诗》外篇,霍松林校注《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碎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74页。

的性格密切相关,李白生性狂放不羁,加之天才纵姿,傲世遗俗,所以其作品大都不受规范的羁绊,兴会所至,随意挥洒,达到了自然天成的境界。而王昌龄性情温敛,不尚张扬,因而其作品大都悠游不迫、含而不露,注重炼字琢句,给中规中矩、恪守章法的感觉。那么,由余俨对二人七绝的选择态度可看出,他更为欣赏的是李白真率自然的诗歌风格以及由此体现出的诗人随性自由、不受拘束、自然天真的性格。这一性格不仅属于诗人李白,同时也属于编者余俨。据王铎《余望之传》记载,余俨从北都归越途中,吟诗遇喜处即大叫,声音震林木。壬午兵变后由清源至杭,得酒,与友登顿山寺,握麈尾辩说数千言,至吟得意则醉卧草间,灶米不给亦不问。生动展现了余俨无拘无束、率性自然的性格特征。正因为余俨与李白个性上的这种相似之处,才使他以大量的篇幅选取了与自己性情契合,能在近千年后产生心灵共鸣的作品。应当说,这样的选择结果不仅是余俨本人之性情所好,同时也是整个时代崇尚个性与自我的精神在选诗领域的一个投影。

万历时期的诗坛流派纷争,壁垒分明,宗唐宗宋,针锋相对。余俨身处此时,虽命运多舛,然为人真率坦直,醉心于诗歌创作,尤慕唐诗,其所编选《唐世精华》以个体“性情”作为选诗标准,为晚明文坛的主“情”大潮推波助澜,在明代诗歌思潮发展中以独特的选诗方式彰显着编者的个性主张,在明代诗歌流派的相互较量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如此,《唐世精华》作为一部诗歌选本,在其所选的近七百首作品中,初盛唐为435首,中晚唐为256首,且大都选入了盛唐名家的经典名篇,其中李白与杜甫两位诗坛巨匠的诗歌数量位居前两位。同时它又冲破了复古派“诗必盛唐”的格套束缚,对中晚唐诗并非一概吐弃,在七律与七绝两种体式的选择中,中晚唐入选数量均超过初盛唐,李商隐、杜牧、许浑等人的名篇佳作亦收入其中。可见,《唐世精华》不仅是一部体现选家个性色彩的唐诗选本,同时也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唐诗选本。

【作者简介】孙欣欣,女,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